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9

《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

「評點」的解釋類型

—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

張素卿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10

10

「評點」的解釋類型—— 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

張素卿*

一、引言：何謂「評點」

「評點」是中國典籍中一種獨具特色的文獻形式。它最顯著的形式特徵，就是有「點」、有「評」，並且依附於所「點」、「評」的對象——本文(text)。所謂「點」，包括圈、點、抹、畫等標示符號；¹「評」則包括夾注、旁說、眉批或尾論等語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¹ 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圈點等符號，性質不盡相同，或用於校勘，作為對照；或用於標音，表示平上去入四聲；或用於句讀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屬於語法符號；有別於上述三類，評點文獻中用以分析本文的圈點抹畫符號，或稱為賞鑒符號。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對於古代各家的符號體系及其用法一一考述，上述四類符號管氏統稱「標點符號」。然而，1919年11月，胡適和周作人、錢玄同等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議案修訂文收入《胡適文存》第1集，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所謂「標點符號」專指「文法的符號」，文中提到：「中國舊有的標點符號只有一個句號，一個讀號」，又說：「後來的文人用濃圈密點來表示心裡所賞識的句子，於是把從前文法的符號變成了賞鑒的符號」(《胡適文存》，頁116)。胡適等人當年的觀察並不正確，不煩細辨。唯「標點符號」一詞既已相沿用以指稱所謂的「文法的符號」，亦即語法符號，為避免混淆，評點的符號名稱似宜有所區別。評點文獻有時也標有句讀等語法符號，但真正代表此類文獻特色的是分析本文的圈點

言文字；不論「點」或「評」，它們基本上是依附於本文的，或分佈在字裡行間，或置諸天頭、篇末，與本文一併呈現。尾論通常自成段落地表達見解而可以單獨呈現，夾注、旁說或眉批則往往需要配合所指涉的本文才能瞭然明悉，至於圈、點、抹、畫等符號更是必須隨文標示。

「點」或「評」不離本文以分析其脈絡 (context)，甚至品藻或評論。若依據這樣的形式特徵來界定，則「評點」文獻是一種運用標式符號、語言文字，依附於本文加以分析或批評的文獻。符合如此界定的現存「評點」文獻，首推南宋呂祖謙 (伯恭、東萊，1137-1181) 之《古文關鍵》。²若以這部文獻為指標，考察呂氏的家學淵源，以及同時人朱熹 (元晦，1130-1200) 的讀書法，乃至朱、呂後學一脈相承之標點經書的傳統，那麼，我們可以注意到：儒者運用標示符號或語言文字以分析經典本

抹畫等符號，其性質亦不限於賞鑒，故本論文稱之為「標示符號」。

² 說參朱世英、方道、劉國華：《中國散文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914-915；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32；以及吳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13。雖然孫琴安將唐代《河嶽英靈集》和《中興間氣集》視為最早的詩歌評點，似乎「評點」文獻的產生可以上溯至唐代。然而，這兩部詩歌選集實際上只有「評」而無「點」，孫氏也坦承這不能作為嚴格意義上的評點(《中國評點文學史》，頁19)；而宋人評點，孫氏之論亦始自呂祖謙《古文關鍵》(《中國評點文學史》，頁28)。何以唐至南宋之間竟一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評點出現？其實，《河嶽英靈集》、《中興間氣集》或總論某家之詩，或摘舉佳句加以品評，仍只是評點文獻的先導，嚴格而言，這跟「評點」運用標示符號、語言文字以分析本文脈絡而呈現閱讀流程，不論形式或性質都還有相當的差異。

文，與其說爲了批評，毋寧說是爲了閱讀和理解。由於迄今爲止的評點研究，多以小說、戲曲、古文或詩、詞爲主，而經書評點以及宋元以來諸儒一脈相承的標點讀經風氣，相對仍受忽視。³歷來學者爲評點溯源，或從符號的運用，追溯到先秦兩漢文獻中的一些讀書標記；或從語言文字的說明及形式，考察經注形式、文論或詩話等文學批評、詩文選集，甚至科舉考試的影響等。⁴這些面向的研究成果已相當可觀。以既有的研究概況爲參照，本論文之考察將以宋元儒者批點讀經之法及其與經書評點的關聯爲主要線索，呈現評點與儒家的經典閱讀活動

³ 小說、戲曲等專門領域的評點研究姑且不論，通論性的著作如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實仍侷限於詩、文、小說的「文學」視野裡，未脫前人窠臼。2002年11月復旦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上海舉辦了一場「中國文學評點研究」國際研討會，可以說是評點研究的一個里程碑，《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即此次會議之論文集，依此觀之，學者之研究仍以小說、戲曲評點爲主，略及古文和詞籍評點，各只有一篇；另外，日本學者高津孝的論文〈明代評點考〉，其中第二節「史書與評點」，論及《史記》等史書評點。

⁴ 如吳承學：〈儒學與評點之學〉，《華學》第一期（1995年8月），認爲評點受到「古代經學、訓詁句讀之學、詩文選本注本、詩話等形式的綜合影響」（頁41），並提及科舉的「刺激作用」（頁42），出土文獻中表示「章句、句讀的標點符號」（頁46）等；這篇論文，曾另以〈評點形態源流〉爲題發表，後收入吳氏：《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又如張伯偉〈評點溯源〉一文，從章句、文論、科舉和評唱四方面考察，在經注形式中特別強調章句之學與評點的關係，尤其立專節討論「科舉與評點」，認爲宋代以「經義」取士，而「最早的評點書，不涉及詩而涉及文，又多講究文法、格式，根本原因即在於此」，最後概括說：「章句提供了符號和格式的借鑑，前人論文的演變決定了評點的重心，科舉激發了評唱的產生，評唱樹立了寫作的樣板。」（見《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1-54）其他大同小異的論述，不煩贅舉。

之關聯，論述的策略為集中議題以彰顯評點作為展示閱讀活動的基本性質及其意義。目前，研究者往往將評點視為是「文學批評」的一種形式，相對於此，本論文由上述的主要線索進行一個側面的考察，論述評點的基本性質，進而提出這是一種「解釋類型」的說法，⁵或亦可以激發不同的思考。宋元儒者讀經活動與評點文獻的產生和發展，既有其脈絡可循，這跟明清經書評點的異同所在，文中也有概略的論述。由此一側面考察提出的說法，是否可以擴展至其它側面的評點研究，自然有待更廣泛的檢驗。

大體而言，從運用標示符號、語言文字的形式特徵出發，掌握其依附本文以分析其脈絡的特點，評點基本上是一種閱讀活動的展示，旨在引導讀者通達意義之理解；由於是定型的閱讀，它引導讀者理解的是特定的意義。就此而言，評點可以說是一種「解釋類型」。閱讀活動總是趨向於意義之理解，以理解為基礎，自可以進一步品藻或評論。品藻或評論可以是整體

⁵ 吳承學〈儒學與評點之學〉關注儒家經學的影響，從而論及宋元儒者的讀書方式；他在新近發表的論文〈現存評點第一書〉之中，還簡略比較評點和訓詁注釋，更描述評點是「以標志符號和語言文字的評論，……展開閱讀的進程」（《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 222-223）。這些，跟本人一貫的思路十分類似，最後引述的一段文字甚至跟本人先前在研討會發表過的論文都用語相近，驚訝之餘，雖然私下一度有「德不孤，必有隣」的喜悅，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糾葛，這次重新修訂舊稿，雷同近似的文字儘量改寫，原先簡要陳述者再作申說闡明；唯涉及基本用語及論點難以輕言改變，則加強思維理路之說明，力求深入一層。至於評點的閱讀活動，基本上是由離而合的理解進程，本人即由閱讀和理解進而說它是一種「解釋類型」，此一旨趣，見聞所及的評點研究者迄今未有所論述。

閱讀活動的一環，因而是評點的功能之一；唯若僅僅侷限於文學批評的視野，瑣細零碎的印象揮之不去，評點的價值反而不彰。評點的積極價值之一，應是促使吾人關注於閱讀，這是依本文脈絡由離而合以通達理解的進程，聚焦於「閱讀」和「理解」，評點的詮釋學意義將更形彰顯。

二、端緒：古代傳抄或閱讀的標記

經典作為歷史流傳物，對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讀者不斷綻出新意，而經典與讀者最基本的連繫終究須落實在閱讀活動之中。本文作為具體可徵的載體，是閱讀的實際對象，閱讀活動即以本文為中心而展開。讀者固然可以純粹地默誦心惟，唯若運用一些符號略加標記，或以語言文字申抒數語，藉此記錄一己讀書的過程和心得感發，甚或傳示於他人來擴展其效應，這未嘗不是極其自然的活動。評點的產生與發展，最終源自於諸如此類的閱讀活動。

《禮記·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這是古人閱讀經典的初始工夫。所謂「離經」，鄭玄（康成，127-200）說：「斷句絕也」，孔穎達（冲遠，574-648）進一步解釋：「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⁶指依「經理」以釐析本文章句。所謂「經

⁶ 見《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影清嘉慶20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頁649。

理」，固然涉及經之義理，若就分章斷句的入手工夫言之，也未嘗與文理無關。分析本文乃基礎的工夫，注解詮釋，闡發義理，都由此奠基，不容躐等。孔穎達曾因服虔（子慎，？-188）斷句之失誤，譏諷他「尙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⁷言下之意，閱讀經典須由區分章句入手，這是注解不可或缺的基礎。區分章句即離析經典之本文，這關聯著對其義理內涵的理解，由理解乃有經典的解釋。

因應離析章句的實際需要，中國古代很早就開始運用符號以爲標示。先秦兩漢的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以及簡牘、帛書之中，已經有不少離析章句的符號。⁸以1959年武威出土的漢簡《儀禮》爲例，甲、乙、丙三種簡冊中，諸如大圓點、中圓點、圓圈、黑三角、扁方框、鉤識號或頓號等，或表重文，或表句讀，或用於章首，或用於平行名詞之間，大體說來，既有書寫者傳抄所作的記號，也有讀者誦習時的標示。⁹就誦習閱讀的標示而言，傳世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如東方朔上書凡三千奏牘，漢武帝讀之，「止，輒乙其處」。¹⁰這是耳熟能詳的

⁷ 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影清嘉慶20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頁827。

⁸ 參考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3-44；董洪利：《古籍的闡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34-139；及任遠：《句讀學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1-12；及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頁1-6。

⁹ 參考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08-309；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頁5及頁95-99。

¹⁰ 《史記·滑稽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205。

一則典故，「乙」指鉤識的標示，段玉裁說：「今人讀書有所鉤勒，即此」，¹¹依段氏所言，這種閱讀時因停頓而隨手標記的符號，似乎自漢至清沿用未改。然而，這究竟是語句抑或是文章段落的停頓？漢武帝的「乙其處」，跟清代段玉裁所說的「鉤勒」，它們的符號指稱真的沒有差異嗎？由於文獻記載的限制，只好闕疑。

三國時曾有一種「朱墨別異」的讀書法，據《魏略》記載，董遇（季直，約 190-250）「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因爲董氏認爲「讀書百徧而義自見」，故不肯傳授，結果「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¹²漢魏六朝人有一種以朱墨分鈔經、傳的方式，而董遇的「朱墨別異」，當不只是如此，而是涉及閱讀經傳的心得領會，「朱墨別異」即用以標示他的獨得之祕，因此才不肯輕易教人。可惜董遇不肯教學者，所以「無傳其朱墨者」。

先秦兩漢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中的符號，是否跟後來的評點有何淵源，還難以斷言。漢武帝「止，輒乙其處」的符號運用，有限的記載裡，不確知他的停頓代表何種意義？不知當時讀書人是否普遍如此運用？至於漢魏至唐的學者以朱墨分抄經傳，¹³也不必然涉及經傳本文之分析，而且與運用標示符號

¹¹ 《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十二篇下，頁633。

¹² 見《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裴松之《注》引，頁420。

¹³ 清程大中《考古叢編》云：「書以朱墨評點，明時盛行，《隋·經籍志》有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蓋自漢有之。」此說促使學者回顧古代學

或語言文字以表達見解，性質有別。至於董遇「朱墨別異」，可能涉及《左傳》的閱讀與理解，只是後無傳者，無從詳論；宋以後的評點，大概也與此無直接關聯。另外，若說分章析句的治經方式對後儒有影響，固無不可；至於漢代經師由分章析句發展出「章句」之體，由於這類文獻早已亡佚，其體例形式究竟如何還難以斷言，¹⁴那麼，逕指它對評點有何影響，都不無商榷之餘地。諸如此類，若說與評點有何淵源，也只是遠源，還只是形似的或外緣的關係。

三、宋元儒者讀經及其標抹之法

自從漢代獨尊儒術以後，儒家經典成爲歷代學者熟讀細究的首要對象。若說注疏表徵的是普獲官學和知識階層所重視的治經的大傳統，評點相對而言則是一個小傳統。

評點的起源，無疑與閱讀活動有密切的關聯，運用標示符

者以朱墨分色書抄寫經傳的現象，如〈儒學與評點之學〉(頁47)、《句讀學論稿》(頁6)等均曾論及；張伯偉〈評點溯源〉更補充了〈古文孝經孔氏傳序〉「朱以發經，墨以起傳」，及《經典釋文·敘錄》「墨書經本，朱字辨注」諸例，(見《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5)。然而，朱墨分書經傳，頂多只是評點文獻形式上的淵源之一，性質仍有所不同。

¹⁴ 西漢宣帝時諸經章句始正式成立，浮辭飾說而日趨繁瑣，未必「具載本文」；後來又由繁趨簡，並逐漸與傳注合流，現存王逸《楚辭章句》和趙岐《孟子章句》當時非屬經學，又都出自章句減省之後，不盡然可以代表漢代諸經章句的面貌。說見張寶三：〈漢代章句之學論考〉，《臺大中文學報》十四期(2001年5月)，頁49-63。

號這一項特徵，尤其應從古人的閱讀活動中探尋其淵源。原先可能是純屬個人的隨機標記，後來，有些學者擬訂成系統的符號，發展為讀文之法的通則定式；甚至，配合印刷術的發展，以及因應科舉時文的需求等客觀條件，這種將標示符號附隨本文刊刻的文獻於是形成，並逐漸流傳風行。

由個人的閱讀活動進而擬定一套方法來進行標記，形成廣泛影響，促成新的文獻形式產生，宋代是一個關鍵時期。當時儒者讀書的筆抹標記之法跟評點文獻的產生有密切的關聯，呂祖謙則是首應關注的對象。呂氏以及同時的朱熹，他們的讀書觀念和方法直接影響了麗澤書院諸儒，宋、元之際儒者一脈相承的學術統緒，可以讓我們一窺當時以筆抹標點之法讀經的概況。

（一）呂祖謙的家學及其《古文關鍵》

如第一節所陳，呂祖謙《古文關鍵》是現存第一部運用標示符號和語言文字以分析本文脈絡的評點文獻。

探討《古文關鍵》的來由，不能忽略呂祖謙的家學淵源。他身為東萊呂氏的傳人，素有家學法度。與他同時並頗有往來的朱熹，曾經就聞見所及，述及呂氏讀書之法，曰：

某曾見大東萊（呂居仁）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

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¹⁵

依朱熹所述，可以略窺呂氏治經讀書的法度，閱讀六經、三傳及注、疏，皆親手圈點、點畫，朱熹曾親見呂氏他所標點的《禮記》，據說不僅《禮記》如此，諸呂研讀群經皆依此法度。大抵就經、傳及注、疏之本文加以圈點，或亦分色，如疏「用朱點」。圈點可能以句讀為主，也可能不限於句讀；所謂「無點畫草」，畫殆即抹畫。根據呂祖謙從子呂喬年為他所編之〈年譜〉，他閱讀《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都有標抹本；¹⁶此外，依吳師道（正傳，1283-1344）所述，還曾標抹《儀禮》、《史記》等，吳氏曰：

〔東萊呂子點校本《儀禮》，〕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於上，而注中多改塗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己意。……凡呂子所標抹，必點句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鑑》之類可證也。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意，而所得之精多見於

¹⁵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75。案：大東萊呂本中（居仁）是呂祖謙的祖父呂弼中之兄，朱熹所謂「大東萊（呂居仁）之兄」不知何所指。

¹⁶ 呂喬年編：〈年譜〉「淳熙元年甲午」及「淳熙二年乙未」條，收入《東萊集》「附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頁444、445。

此。……呂本雖非完，尤當寶惜，恐久而放失者也。¹⁷

依此而言，呂氏諸書之「標抹本」，其符號包括「點」和「抹」，「點」或許以點定句讀為主；此外，以「抹」筆畫字句，表其要義精微所在，故呂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意」。¹⁸至於校書有得，即注明己見，高揭於本文上方，故謂之「標」或「標注」。標注《儀禮》時，可能偏重板本校勘，故標異兩存，或塗改斷以己意。吳師道說「呂本雖非完」，不知是否指呂氏的標抹本《儀禮》並未成書？或者其他如閱讀經、史而隨文標抹者，可能也都是純屬個人點畫箋釋的讀本而已。呂祖謙標抹著作刊行而流傳至今者，主要有《古文關鍵》一書，¹⁹體例詳明，影響深遠，尤其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呂祖謙「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²⁰上承家傳的讀書法度，不僅以之讀經，兼用治史，而且運用在唐宋古文的

¹⁷ 吳師道：《禮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頁249。

¹⁸ 俞樾《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據《杜陽雜編》「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至尾」記載，謂「評閱文字之用筆抹，唐世已然」（頁182）。抹的標記見於唐代，當時用以畫出「詞理乖謬」者，其性質與呂氏之抹畫相反。評點的圈點抹畫是分析本文的符號，有其相互區分的作用，追溯其符號的來源，不宜只顧形似而忽略其性質，此亦一例。

¹⁹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一部《東萊先生標注三國志詳節》，為宋紹熙（1190-1194）間建陽書坊刊巾箱本，此書在本文欄框上方有標注，非異文校勘，而是逢段落處簡注數語以提示旨意，且其符號非用以分析本文，暫置不論。

²⁰ 呂祖儉：〈壙記〉，收入《東萊集》附錄，頁448。

評選上。《古文關鍵》一書選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等唐宋古文大家的文章，依陳振孫(伯玉，1179-1283)所言，此書「標抹注釋，以教初學」，²¹爲此後一系列的古文選集開宗立範。《古文關鍵》卷首有〈總論看文字法〉、〈看韓文法〉、〈看柳文法〉、〈看歐文法〉、〈看蘇文法〉、〈看諸家文法〉、〈看諸家文法〉及〈論作文法〉等。〈總論看文字法〉揭舉閱讀的通則：

第一看大概、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²²

²¹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書目續編影武英殿聚珍本)，頁937。

²² 呂祖謙：《古文關鍵》(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影清刻本)，頁17-18。引文的標點參考吳承學之說，見〈現存評點第一書〉，《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224。吳氏並說：「東萊〈總論看文字法〉提出評點的總原則，與該書中隨文的評點相比，是比較有系統的閱讀理論。一般說來，評點形態的毛病在於比較零碎，缺乏系統，而〈總論看文字法〉比較明確系統提出評點的原則和方法，一定程度上補了這一缺陷。」(頁226)試問：「比較零碎，缺乏系統」的「毛病」何以沒有隨著評點的發展而逐漸改變(改善)呢？如果「比較零碎，缺乏系統」的印象來自隨文的「批評」，是「文學批評」觀點的考察，那麼，我們是否根本應該換方式思考？誠如吳氏所言，〈總論看文字法〉是閱讀的理論通則，相對的，隨文的評點則是基於

依此，閱讀之法首應綜覽整體，先掌握「大概、主張」；其次觀察組成一篇之中的各個部分，包括「文勢、規模」和「綱目、關鍵」，著眼於上下文的鋪陳、呼應及開合，各個部分的組織佈局；再則注意其「警策、句法」，玩味字句修辭，包括如何遣字用辭，如何剪裁、轉折、起結等，品藻鑒賞多屬此一層面。

以韓愈的〈師說〉為例，呂祖謙在開篇處指出首兩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乃全篇「大意」；篇題之下有總論，謂「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區分本文為若干段落，隨文並以「L」標示符號畫出段落分界，由此可進觀其「文勢、規模」；行間字側，或箋識「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為綱目，或指「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本意，或提示各段之意如何相承相應、如何鋪陳、如何開合；其他，如謂第三段「生乎吾前」為「承接緊、有精神」，謂末段「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為「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處意，綱目不亂」，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為「結有力」等。這些文字說明，是對應〈總論看文字法〉之通則的閱讀實踐，而其指涉顯然得依附本文來了解。俞樾（1821-1906）《古文關鍵·跋》述及該書之標示符號，曰：「凡文中精神命脈，悉用筆抹出；其用字得力處，則或以點識之；

前述理論通則的實踐運用，若從理解本文的整體過程觀之，庶可跳脫「零碎」的刻板印象。

而段落所在，則鈎乙其旁，以醒讀者之目。」²³則此書的符號有「抹」、有「點」，以及區分段落的「鈎」。所謂「用字得力處，則或以點識之」，此處的「點」已非表示句讀的語法符號，而是標示其用字，涉及本文之修辭。這樣依附本文，且兼用標示符號和語言文字，具備評點的形式特徵。而且，針對本文掌握其大概、主張、文勢、規模、綱目、關鍵、警策、字句等，領會其立意和承應布局之經營。如此閱讀韓、柳、歐、蘇等唐宋古文大家之作，甚至諸家之文，進一步導向學習其作文之法。

古人讀書，以「離經辨志」為入手工夫，呂祖謙以為：「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此只是看文義。」²⁴此處我們不必細究他對「離經辨志」的解釋是否諦當，畢竟他是依循「分文」、「看文義」的進路治經讀書。「分文」，遠襲古人分章析句的讀經工夫，或許也頗受義疏「區分章段」之學影響，²⁵無論如何，《古文關鍵》將之擬定為通則，「分文」具現為一篇文章的段落區分，而且是「標抹注釋」整體閱讀之法的一環，往往以標示符號和語言文字相應，都用以「看文字」，亦即針

²³ 見《古文關鍵》，頁318。依俞樾《跋》，《古文關鍵》的標示符號包括抹、點及鈎，但廣文書局影印的清代刻本（蔡文子註、徐樹屏考異本），已刪除抹（參見〈凡例〉，頁6）。日本文化元年（1804）刻本《古文關鍵》，殆為目前保存抹、點等符號較完整且清晰的板本，說參杜海軍：《呂祖謙文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154及頁160-161。

²⁴ 呂祖謙：〈雜說〉，《東萊集》，頁437。

²⁵ 參考張伯偉：〈評點溯源〉，《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8。關於唐人義疏之「區分章段」，詳參張寶三：《五經正義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6月）第五章第一節，頁203-216。

對本文脈絡，分析其開合承接。「看文字」其實還是爲了「看文義」，《古文關鍵》中屢屢強調「意」，指的是具現在本文脈絡之中，前後貫通的意義。²⁶例如針對韓愈（退之、昌黎，768-824）〈師說〉，呂氏指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是全篇「大意」，又說「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切就本文以理解其「意」，大概就是呂祖謙引導初學尋索的「文義」。這樣理解本文的意義是閱讀的旨趣，並綜觀其文勢、規模等結構布局或用字修辭之法。在實踐〈看文字法〉的閱讀活動中，呂祖謙顯然以其既有的理解爲前提，引導初學者如何分析離合而通達意義之理解，這同時就是對本文進行解釋。

就歷史淵源而言，宋代科舉以「經義」取士，這對於呂祖謙分析本文的若干觀念，以及促使他標抹《古文關鍵》以教導初學有一定的影響，²⁷朱熹曾挖苦說：「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然則，注意呂祖謙與經義時文的關係時，同樣不應忽略呂氏的家學淵源，呂氏的讀書法度，原本屬於私家個人的閱讀活動，不必然含有實用目的。又如朱熹，他挖苦呂祖謙，

²⁶ 杜海軍對於《古文關鍵》的「意」有所討論，認為是「作家通過構思的作用，把意和辭統一的意」。說見《呂祖謙文學研究》，頁166。

²⁷ 吳承學曾經從《古文關鍵》中出現破題、罵題等術語，提及這對明清「八股文」的影響，說見〈現存評點第一書〉，《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226。其實，「八股文」源自宋代「經義」，而呂祖謙《古文關鍵》與科舉時文的關聯，首先應該注意的是「經義」，其結撰格式可參考葉國良：〈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年6月），頁45-52。

卻也頗以標抹法讀書（說參下文），這同樣屬於個人的閱讀活動。如此之類的實例尚多，隨文標抹的評點毋寧是在個人閱讀活動中自然形成的。就性質而言，評點起源於閱讀活動，不論讀書是否爲了科舉或其它實用目的。至於以經義取士的科舉制度，或印刷術發達的傳播因素等，自然可以看作是帶動評點興盛的社會動力，可以說明此種文獻何以是在宋代正式出現，但畢竟屬於外緣因素。

相較於董遇「朱墨別異」終致失傳，呂氏評點之學卻隨著《古文關鍵》流通至今，成爲《文章正宗》、《崇古文訣》、《文章軌範》等一系列古文選集的先導，其傳播和啓蒙的文化功能不容輕忽。應予強調的是：刊刻流傳的《古文關鍵》雖說是評點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如上文所述，這種閱讀法呂祖謙實乃「習於家庭」，從呂氏家學中閱讀《禮記》、群經的法度發展而來。

（二）朱熹讀經的標抹法及其觀念

朱熹在儒家經典的注疏傳統中，無疑相當具有代表性，他詮釋經典的思想體系對後世影響極大，他的經解注釋從元代開始更成爲科舉考試的權威。從評點發展的小傳統來考察，他標抹讀書的閱讀活動以及觀念，也相當值得注意。

如上所述，朱熹曾親見呂氏閱讀《禮記》時圈點、抹畫的記錄，頗知其讀書法度，而他自己也曾以標抹之法讀書，並自述經驗以訓示門人，教人如此熟讀經典而資體驗。他說：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胸中自是灑落。²⁸

又說：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²⁹

謝良佐（顯道，1050-1103）有《論語說》傳世，上引兩段文字乃朱熹回憶少時閱讀此書的經驗，細節難免有些出入，姑且不論，這裡關注的是他的讀書活動。朱熹熟讀本文凡三四番，先後以紅、青、黃、墨各色筆抹出「語意好處」、或「要領」，標示得趣領會之處，就此玩味體驗。整個閱讀活動以尋繹義理為

²⁸ 《御纂朱子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四庫全書本第721冊），頁534-535。

²⁹ 《朱子語類》，頁2887。

旨趣，不離本文而「漸漸向裏」，這可以說是對本文意義的領會層層精進，是一個理解的進程。

朱熹藉由謝氏《論語說》的解釋，最終是要尋繹經典的義理、體驗聖人之心。在閱讀活動的理解進程中，除反覆數番玩味其「語意好處」，或者「要領」，也不忘留意於構成本文的字、句、段落，逐次理會，他說：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³⁰

逐段、逐句、逐字地理會本文，甚或看了又看反覆數番，乃至參考各家解釋，這樣熟讀而浹洽通透，直至「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最後關鍵仍在切己體驗。這樣讀經，玩味義理、切己體驗，而不離乎本文，那麼義理的理解進程也就是閱讀本文的過程。以朱熹的實踐而言，閱讀活動中何妨隨手運用抹畫分色的方式加以標示，如當年閱讀《論語說》的情形一般，這樣尋繹本文，與領會道理之精微，可以融貫無礙。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朱熹論學固然以切己體驗義理為首要，仍十分重視讀書，常以自身讀書之法教人，他自述標抹讀書的經驗就是為了現身說法。很顯然的，在他的思想體系裡，熟讀本文以玩味聖人之心，標抹之法不失為

³⁰ 《朱子語類》，頁 2887。

是實踐方案之一。這樣，閱讀經典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義理，他說：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³¹

注重義理之領會，仍不宜偏廢其文章，若能使其「文」、「義」互發，當更能相得益彰。又說：

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³²

玩味涵泳經典本文之餘，還從中通曉作文之法。如熟讀《孟子》，通曉其如何首尾照應、如何血脈貫通，學習其作文之法，取法乎上，俾能作成「第一等文章」。這未嘗不是朱熹教人閱讀經典的方向之一。然而，他教人作文正是要人學作此「第一等文章」，而非套用固定模式的文章，或者應試的科舉時文。朱熹就認為呂祖謙標抹《古文關鍵》之類的方式有此流弊，因而加以批評。他說：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³³

³¹ 《朱子語類》，頁 2083。

³² 《朱子語類》，頁 436。

³³ 《朱子語類》，頁 3321。

朱熹教人讀書、作文，不是爲了教門人應舉作時文，相形之下，他不僅挖苦呂祖謙改變了呂氏家族安樂讀書的法度，對於其看文字和作文之法也有所非議，認爲「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這是朱、呂的差異所在。依朱熹之見，「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文皆是從道中流出」，因此，「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³⁴然則，讀書以理會此道爲旨趣，作文也以涵泳明理爲主而自然發爲文章。凡此論述，自然都是立基在他的道學思想。朱熹說：

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³⁵

唯其「道外有物」，朱熹貫徹其思想體系就不能不正視「道」與「文」的關係，以道學收攝文論，是落實其思想體系而「一以貫之」不可忽略的一項議題。

呂祖謙教人「看文義」，主要是尋繹貫通於本文脈絡之中的意義，相較之下，朱熹教人讀書尋繹義理，有著更爲深厚的思想基礎。朱子教人讀經須以切己體驗聖人之心爲第一要務，卻也不忘提醒學者玩味本文脈絡，甚至從中學習作文之法。閱讀經典是爲了理解經典之義理、體驗聖人之心，他幾番分色筆

³⁴ 《朱子語類》，頁 3319、3305、3307。

³⁵ 朱熹：〈答汪尚書〉，《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影明嘉靖刊本），卷 30，頁 12 上。

抹《論語說》，「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閱讀活動就是一個理解的進程。而且，用筆抹畫的行爲，恰恰表徵著閱讀、理解的過程，有著不離本文的特點。他常用「抹」法，運用紅、青、黃、墨分色標示，可惜未必真有定法以傳授門人。呂祖謙對經典義理的詮釋不及朱熹，然而，他教人重視本文並傳示後學一套閱讀之法及作文之法，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古文關鍵》正爲此應運而生。

（三）金華諸儒的傳承脈絡

呂祖謙與其弟祖儉創立金華麗澤書院，儒者講學傳習不絕，「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³⁶呂氏奠定書院的教育規範，透過教育機制，其標抹讀書之法也在宋、元之際延續發展，隨著何基（子恭，1188-1268）、王柏（會之，1197-1274）、金履祥（吉父，1232-1303）、張翥（達善）、許謙（益之，1270-1337）諸儒一脈相傳，³⁷引發迴響。金華諸儒一方面繼承朱熹的思想學脈，另一方面，依吳師道之考察，其標點《四書》以及群經的讀書治經之法，同時受呂祖謙之影響。

何基是朱熹門人黃榦（直卿，1152-1221）的弟子，有標點《四書》傳世。依弟子王柏形容，何氏讀書，標註之外，間用

³⁶ 全祖望案語，見《宋元學案·麗澤諸儒學案》，收入《黃宗羲全集》本第5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914。

³⁷ 何、王、金、張、許諸儒，《宋元學案》合為〈北山四先生學案〉，學案名稱，黃宗羲原定為〈金華學案〉。同前註，《黃宗羲全集》本第6冊，頁215。

朱筆抹畫，曰：「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小楷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³⁸元人吳師道亦謂何氏「凡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於《四書章句集注》更精讀細究而「悉加點抹」。³⁹此種讀書法經王柏踵繼其後，進而揭櫫條例，影響漸大。王氏曾「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文公去取之意」，不僅如此，「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髓，開後學之耳目」。⁴⁰以鉛黃朱墨分色標抹外，《四書》、《通鑑綱目》更有語言文字提要簡注，故曰「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而題言、點訂，無非藉以指點本文之精髓要意。王柏並將其標抹法訂定條例，效法者眾，程端禮（敬叔，1271-1345）《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一書所載錄之「勉齋批點《四書》例」，其實出自王氏。⁴¹所謂「批點例」，包括「句讀例」

³⁸ 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狀〉，見《何北山遺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影金華叢書本）卷4附錄，頁5上-下。

³⁹ 吳師道：〈節錄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及〈代請立北山書院文〉，《禮部集》，頁293。又，何基標點《四書》，元代曾有刻本流傳，說見吳氏：〈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禮部集》，頁290。

⁴⁰ 葉由庚：〈壙誌〉，見《魯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影金華叢書本），卷10附錄，頁8下-9上。

⁴¹ 據吳師道所言，曰：「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王魯齋所定。……惜遺書之多喪，比年尋訪考求，間獲一二，所恨未識程君，倘各出所有，以相參訂而求其用於心，則往者有知，亦忻於異世之有同我者矣。」（〈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禮部集》，頁240-241）吳氏依尋訪所獲遺書，謂「批點《四書》例」為王柏所定，應當可信。而

和「點抹例」，前者屬於斷句的語法符號，後者才是分析本文的標示符號。就「點抹例」而言，包括「紅中抹（一作黃旁抹）」，標示本文之綱目、凡例；「紅旁抹」則標示其警語、要語；「紅點」，用以指點字義、字眼；另外，以「黑抹」抹出有關考訂、制度之處；未盡之處，輔以「黑點」表示。⁴²不僅程端禮援引王氏條例作為家塾讀經之批點法，據清人魏禧（叔子，1624-1680）所言，汲古閣庋藏元人標點五經，包括《書傳纂註》、《詩集傳》、《易傳義》、《禮記集說》和《春秋胡傳》，其經書標點也大抵參酌王氏「批點例」，⁴³其影響可見一斑。

金履祥先受業於王柏，既而進於何基之門，⁴⁴上承何、王之學與讀書法。據載，他曾經涵泳〈樂記〉，「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⁴⁵於〈中庸〉則「有標抹，又推所得於

且，黃榦向無標點讀書之記載，程元敏先生以「文集不之及（《勉齋集》四十卷，舊鈔本），志傳不著錄，朋友不稱道」三者佐證吳氏之說，亦認為「批點《四書》例」非出自黃榦；程先生並曾參驗於倪士毅《四書輯釋》書首所附「標抹點註凡例」（王柏原訂、張師曾參訂），以及《書集傳纂疏》中吳壽民所述「王魯齋先生凡例」，大略相同。說見氏著：《王柏之生平與學術》，第3冊，頁148-149及頁156-157。吳承學、管錫華等學者討論「批點四書例」，多未注意此一問題，故附述之。

⁴² 見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四部叢刊廣編影元刊本），頁40-41。

⁴³ 魏禧：〈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739。

⁴⁴ 柳貫：〈仁山先生金公行狀〉，《待制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四庫全書本第1210冊），頁506。

⁴⁵ 《待制集》，頁509。金氏分析〈樂記〉篇章，並進而加標段畫符號，為

何、王者，與其己意并載之」。⁴⁶前者，運用段畫符號區分段落；後者，則用抹畫，並有解釋以發揮己意。何基、王柏標點之書，無緣親見，而金氏之畫段、長抹，以及在本文上方標注各段題旨或上下脈絡，這樣的形式，可就其《尚書表注》一窺究竟。金氏自述：

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姪，間以示朋從之士，雖為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碍，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⁴⁷

《尚書表注》書中使用的符號相當多，⁴⁸就性質來分，一部分屬語法符號，標出篇名，山名、水名、國名、州名、官名等專有名詞，⁴⁹以及引語等；亦有用於校訂對照的符號；至於各篇之首所載「書序」，也有專用的符號。此外，還有些符號乃用

此類文獻淵源於唐人義疏「區分章段」的實例之一，並參註 25。

⁴⁶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禮部集》，頁 201。

⁴⁷ 金履祥：〈尚書表注序〉，《仁山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1189 冊），頁 818。

⁴⁸ 管錫華歸納《尚書表注》的符號，分為十二種，一一舉例說明其用法（《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頁 155-159），沒有就各種符號的性質差異作進一步的區分。

⁴⁹ 金履祥用以標點山川地理的符號甚多，主要見於〈禹貢〉一篇，見《尚書表注》卷 1，頁 11 上-14 上。

以分析本文，這包括：一、段畫符號，乃以短橫畫標示在分章段落處；二、抹畫符號，在綱目或精要語句旁，以粗墨抹畫於字右行側，短者或抹一二字，長者或數句。另外，在版框之上下左右有許多文字說明，故謂之「表注」，取意似與「標注」彷彿。「表注」除考正文字、徵稽事跡之外，也有涉及本文分析者，或表彰章旨大意，或分析前章、後章相承之脈絡，或於篇末申發議論。以〈秦誓〉為例，⁵⁰金氏分析其本文，以短橫畫標示段落，而將全篇區分為數段；第一段中，針對本文中秦穆公所引古人之言：「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數語，行右有粗墨長抹；相應於段畫、長抹之標示，欄外天頭並提示大意，曰：「穆公引古人之言，意主受責，盤其病源」云云；並說「『我心之憂』三句，接多盤之戒」，指陳上下文之呼應；又如針對穆公「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一段，金氏曰：「因上文古謀人良士而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此賢相之量也。君子之所以聚，家國之福，穆公懷想形容，殊有意味。」不僅說明其脈絡，並略作發揮；此類段落提示外，此篇之末並有尾論，曰：「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殽敗退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

⁵⁰ 以下描述，參見金履祥：《尚書表注》（臺北：大通書局，1969年影康熙19年通志堂經解本），卷下，頁46下-47下。「書序」部分因非〈秦誓〉本文，不具錄；又，引文加上新式標點符號，依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年重排版），頁203-205。

成懲艾之言，極為真切，穆公平日貪利，功於五伯為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此所以為穆公歟！」綜合而言，標示符號與語言文字之說明相互呼應，隨文分析其要旨所在，並指陳上下承應之脈絡，篇末再加以議論，形式與內容都符合評點之特徵。從評點的發展歷程看，金履祥《尚書表注》是相當值得關注的一部書。

許謙師承金履祥，尤廣泛標點諸經，包括《四書》、《儀禮》、《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以及程頤《易傳》和朱熹《周易本義》、《詩集傳》等。除「分別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謬訛」外，並「標釋段畫，辭不費而義明」，⁵¹而「於大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⁵²句讀及文字校訂之外，分析本文的標示符號有段畫，及以「鉛黃朱墨」表明大綱要旨所在，殆即點或抹；而且，「意有所明，則表見之」，這是所謂「標釋」，為語言文字之說明。

何、王諸儒一脈相承，其標點治經的學風，吳師道以為當溯源於呂祖謙。吳氏曰：

蓋自東萊呂成公用工諸書，點正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魯齋王先生柏會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學則勉齋學也。

⁵¹ 吳師道：〈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禮部集》，頁 290。

⁵² 見《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黃宗羲全集》本第 6 冊，頁 250。

二公所標點不止於《四書》，而《四書》為顯。魯齋……視北山尤詳，學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並游何、王之門，導江張達善，則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來矣。⁵³

諸儒用功經典，以標點《四書》、諸經，淵源所自，當推始於東萊呂氏「點正句讀，加以標抹」的法度。「點正句讀」和「標抹」是兩重工夫，前者是斷定語句，後者則以此為前提，進一步分析本文的脈絡要意。兩者性質不同，但可以相輔而行，如呂氏標抹諸書，同時點正句讀；又如王柏「批點《四書》例」，也包括「句讀例」和「點抹例」。部分評點文獻的確只有點抹之類的標示符號，如今傳《古文關鍵》並無句讀；部分則無句讀而兼含其它的語法符號，如《尚書表注》無句讀，卻運用許多表示專有名詞的符號。語法符號和分析本文的標示符號性質不同，各家可以就其需要斟酌採用。無論如何，依上文之考察而言，王柏、金履祥、許謙之經書標點，實際上都已兼用標示符號和語言文字，並且用以分析本文，其中，說明文字大抵簡要，故學者往往以「辭不費而義明」形容之。⁵⁴

金華諸儒，師承授受，其標抹治經之法淵源有自，而推始

⁵³ 吳師道：《禮部集·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頁240-241。張達善之標點法不詳，既無文獻可考，亦未見吳氏陳述其梗概。

⁵⁴ 吳師道形容何基之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不待論說」是否表示未兼用文字說明？姑闕疑而未與王柏等人並舉。

於東萊呂氏，金華麗澤書院尤爲此學風薈萃之地。吳師道曰：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蓋嘗稽諸成公之教，主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藻之華。故舉業課試之文，獨麗澤兼行。⁵⁵

麗澤之教，兼習舉業課試之文，一方面本於呂氏，發展出「主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藻之華」的治經風氣；另一方面，他們也未嘗忘懷朱熹讀經以明義理的宗旨。諸儒一脈相承，闡發經典義理，以及讀書觀念，實宗傳朱熹之學。朱熹教人讀《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讀《孟子》應熟讀其本文，觀其「首尾照應，血脈通貫」等文理脈絡。朱子、呂氏開其端，至何基、王柏「始集合兩家之長，體例漸嚴，法度斯立，以之治《四書》，且以之治群書」；⁵⁶金氏、張氏、許氏又祖述何、王，加以發揚，以此方式治經讀書的風氣流傳益廣。如此閱讀經典，玩索文脈並尋思義理，由文理脈絡會通義理精微，這種解釋方式更有「辭不費而義明」的優點，教導學者尋繹本文，熟讀精思，以資領會，啓蒙之功自不待言。

這一節由朱熹、呂祖謙以及金華諸儒，勾勒宋元儒者以標抹評點之法讀經的學術脈絡，考述此一小傳統的發展史跡，並

⁵⁵ 吳師道：《禮部集·時所性文鈔後題》，頁 250-251。

⁵⁶ 程元敏：《王柏之生平與學術》，第 3 冊，頁 149。程先生此書對於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人標點經書之法度，考述詳明，可惜評點研究者鮮少注意。本節論述，頗參考此書，誌之以示不敢掩前人之美。

藉以凸顯：儒者之標抹經書，基本上是爲了閱讀和理解，而非爲了批評。呂氏家族以標抹之法治經，原先只爲安樂讀書；呂祖謙傳承家學，起初何嘗不是爲了閱讀，後來因注重教育而編選《古文關鍵》，「標抹注釋，以教初學」，並隨著此書刊行而將此一法度廣泛傳示於學者。朱熹讀書頗運用分色標抹之法，不忘窮其義理以盡其精微，也不離本文以爲玩味體驗之資，「道」與「文」一以貫之，這在他的道學思想裡可以融洽無礙。朱、呂之後，何、王、金、張、許等一脈相承，探求經典義理的同時，也標點經書使其旨意顯明，助學者之傳習。王柏、金履祥、許謙之標點，運用段畫點抹之標示符號，並以語言文字作簡要提示，由本文之分析通達義理之理解，已符合評點的形式特徵，雖然諸儒之提示說明比較簡要，而且偏重義理而非篇章字句之法。依黃百家之見，「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猶幸有斯。」⁵⁷可惜宋、元儒者的評點文獻大多沒有流傳下來，⁵⁸除少數學者約略提及外，評點的形成與儒者閱讀經典的活動之間的淵源，一向被忽略隱沒了。

⁵⁷ 見《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黃宗羲全集》本第6冊，頁299。

⁵⁸ 相傳出自謝枋得、蘇洵批點的《檀弓叢訓》、《蘇評孟子》，俱屬後人偽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武英殿刻本）已有論斷，參見《批點檀弓》及《蘇評孟子》二書之提要（第1冊，頁486及746）。

四、明清以來的經書評點

依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之考察，明代可說是評點發展的全盛期，個別的閱讀活動姑且不論，刊刻印行的文獻明顯增加，出現許多著名的評點家，舉其犖犖大者，如歸有光（熙甫，1507-1571）、唐順之（荆川，1507-1560）、茅坤（鹿門，1512-1601）、李贄（卓吾，1527-1602）、孫鑛（文融，1542-1613）、穆文熙、鍾惺（伯敬，1574-1625）等，甚至有綜取諸家的滙評本問世，而評點的範圍泛及經、史、子、集四部，就文學而言，包括詩、詞、散文、小說以及戲曲。⁵⁹至於清代，詩歌、小說評點的持續發展固不待言，散文評點也以桐城派為主自成一系，自創始人方苞（靈皋，1668-1749）起，較著名者如劉大櫟（才甫，1698-1779）、姚鼐（姬傳，1732-1815）、李文淵（靜叔，1741-1766）、吳汝綸（摯甫，1840-1903）等，都有不少評點文獻，其中包括經書評點。⁶⁰民國初年，如林紓（琴南，1852-1924）、嚴復（幾道，1853-1921）、梁啟超（任公，1873-1928）、黃侃（季剛，1886-1935）等，仍有若干學者延續評點的傳統遺風。⁶¹

專就經書評點而言，李贄素以小說評點著稱，也有《四書

⁵⁹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87-174。

⁶⁰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265-280 及頁 320-323。孫琴安不僅評述方苞、劉大櫟、姚鼐、吳汝綸諸大家，並羅列許多桐城派評點家的著作簡目。又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亦有專節討論「桐城派的標點符號理論和評點實踐」，頁 269-293。

⁶¹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323。

評》傳世；⁶²以經書評點的熱門對象《左傳》言之，上舉孫鑛、穆文熙、鍾惺、方苞、劉大櫟、姚鼐、李文淵、吳汝綸、林紓等，都曾經評點《左傳》。其中，孫鑛的評點更泛及群經，有《孫月峰評經》，依書前所列目錄觀之，孫氏評點的典籍計有四十三種，其實遍及四部典籍。⁶³郭紹虞曾指出，明代文學發展的一大特點，即是從「文」的觀點徧閱群書，孫鑛正是實踐此一文學觀念的代表。⁶⁴清代經書評點中，桐城派是令人矚目的代表，而開派宗師方苞首應注意。由於評點著作甚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考述，以下即以孫鑛及方苞為代表稍作論述，期能略窺明清經書評點與宋元儒者標點讀經之異同，陳述其梗概。

以孫鑛的評點而言，注重經典「文」的層面固然是一項特點，頻用濃圈密點，可惜所見《孫月峰評經》並未載明孫氏有無讀法通則，不確知其圈點符號如何區別。而且，無論《詩經》、《尚書》或《禮記》等；孫氏一味強調章法、句法、字法、鍊法或調法等，⁶⁵如評《詩經·河廣》，在本文首章「誰謂河廣？

⁶² 李贄：《四書評》（仿古線裝影刻本，出版資料不詳）。此書除了刻印李贄的評點，並有以朱墨筆添加的眉批、旁注和圈點，想必出自閱讀李氏書的讀者，影印本實包含了兩重評點。此書蒙黃俊傑先生慷慨借閱，特此誌謝。

⁶³ 見《孫月峰評經》（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50冊，影明末天益山刻本），頁213-214。

⁶⁴ 說參郭紹虞，郭氏認為，「假使說清代人對於六經看作都是史，那麼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經看作都是文」，從「文」的觀點閱讀群書，包括經典，這是明代文學思想的一種趨勢，也可說是明代經書評點發展的趨勢。說見氏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88年），頁389-394。

⁶⁵ 孫琴安謂「孫鑛的文學評點，多側重文學性，尤喜論法」云云（《中國評

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諸字右側一一加圈，章末分析呼應篇旨，曰：「但灑灑言宋之近，曾不一及欲往之意，然意亦涌渤。句法頓挫，自呼應，絕有妙致。」⁶⁶又如評〈鹿鳴〉，除在「吹笙鼓簧」及「以燕樂嘉賓之心」諸字旁加點外，只綜論曰：「調則平和，意則渾融。」⁶⁷又如《尚書·牧誓》，全篇連圈或連點甚多，在本文「牝雞無晨」四字旁加圈，並註曰「字法」；針對周武王數落紂之罪狀，「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一段，中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諸字，字旁連標圓點（如「·」），並眉批曰：「連用五『是』，字法」，此外諸字則以長點標示（如「、」），眉批曰：「數紂罪」。⁶⁸孫氏的評點問題頗多，語言文字的評論太過簡略，而且跟標示符號之間的呼應不緊密，也未必能因應經典本文作適切之指引。比如〈牧誓〉中，武王數落商紂罪狀，「惟婦言是用」居其首，孫氏何以不作標示？而且，此篇「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諸字旁標示圓點表示字法，相對的，〈武成〉篇「厥四月哉生明」之「哉生明」三字，亦云「字」以表示應於

點文學史》，頁 122），但也語焉不詳。所謂「法」，包括章法、句法、字法等，頗承襲謝枋得《文章軌範》之矩矱。

⁶⁶ 《孫月峰評經》，頁 64。〈河廣〉一詩之篇旨，孫鑛依「詩序」，在篇題下具引「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⁶⁷ 《孫月峰評經》，頁 83。

⁶⁸ 《孫月峰評經》，頁 171。

此處看字法，標示符號卻用長點，⁶⁹差異何在？雖然孫氏對大家不經意的經典本文詳品細玩，誠不失為大膽嘗試，有些分析亦有見地；然而，謂《禮記》〈曲禮上〉〈曲禮下〉「二篇是百鍊精金，敘事入神，談理入妙」，⁷⁰此種論斷，顯得浮誇而令人莫名所以，難以服人。孫鑛的經書評點所以屢受非議，⁷¹蓋非無因。

呂祖謙上承家學，由經書評點，擴展到古文，相對的，清代桐城派評點，可以說是從古文評點，重新關注於經書。唐、宋古文運動，一直含有取法經典的觀念，《古文關鍵》以降的古文評點，以及由方苞開其端的桐城派仍承襲此一觀念。何況「選集」一向有編選某領域應讀必讀的「正典」(canon)的作用，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降，古文選集常將《春秋》三傳或《禮記》等儒家經典編入其中，列在書首，說明這些經典在古文的領域裡猶具「正典」地位，適足以作為經典流衍於文學領域而發揮其影響力的具體表徵。

方苞論古文，提倡「義法」，〈古文約選例〉曰：「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而〈又書貨殖傳後〉一方

⁶⁹ 《孫月峰評經》，頁171。

⁷⁰ 《孫月峰評經》，頁215。

⁷¹ 閱讀經典，可以「文」、「義」互發，卻也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經不可僅以文論」，而「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第1冊，頁691)。僅僅從「文」的觀點讀經、評經，正是孫鑛的侷限，也是明人經書評點跟朱熹一系儒者之標點讀經的差異所在。

面說明「義」即「言有物」，「法」指「言有序」，並說「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認為《左傳》尤能具體展現「義法」。⁷²方氏《左傳義法舉要》一書即依循此一見解，評點《左傳》。依方氏的說法，首先，我們可以瞭解桐城派將儒家經典視為古文根源的自我意識，這其實是承襲韓愈、柳宗元以來古文家既有的觀念，因此，桐城諸家之評點，乃從古文，擴及於經書；其次，在「義法」觀念的主導下，桐城派的評點，注意的不僅是「言有序」的文章法度，同時注重「言有物」，也就是經典的事義或內容。這兩點都顯然與孫鑛所代表的明人評點有所不同。而且，從「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可知《左傳》、《史記》何以成為熱門的評點對象。當然，方氏認為「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試以《左傳義法舉要》為例，略見其評點法度之一斑。

與孫鑛為代表的明人評點相較，方苞《左傳義法舉要》的標示符號趨於簡要，且符號標示與文字說明常相呼應。如〈城濮之戰〉篇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對此一段文字，方氏僅僅在「德」字旁標一圓圈，隨即在此段文字下夾注云：「德字直貫篇末『能以德攻』，晉侯惟有德，故能上德也。」又如篇中「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

⁷²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年影咸豐元年刊本），頁40。

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一段，方氏於本文之下夾注云：「子玉無德無禮，不能勤民，具見於此，又與晉侯之疑懼戒敬相映。」又在「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又云：「有德而能勤民，具見於此。」文中記榮黃之語：「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方氏既在「不勤民」三字旁加圈，並指陳其呼應處，云「與晉之勤民反對。」篇末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餘毒也已。蔣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方氏又在「不在民」三字旁加圈，並云：「與子玉之不能勤民相映，又與晉之能勤民反對，故以結通篇。」篇後復有尾評，貫申申述曰：「唐宋諸家之文終篇一義相貫，譬如萬派同源，百枝共本，不如此則氣脈斷隔，而篇法爲之裂矣。……此篇（〈城濮之戰〉）以德、禮、勤民三義相貫，間見層出，融洽無閒」，又曰：「敘事之文最苦散漫無檢局，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外，微事亦兩兩相對。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子玉無德無禮，不能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間晉侯能用人，言不獨博謀於卿大夫，且下及輿人；得臣剛愎自用，不獨榮黃之諫不聽，楚眾欲還不從，即楚子之命亦不受，又一反對也。楚子不欲戰而得臣強之，晉侯疑於戰而諸臣決之，又一反對也。晉侯之夢似凶而終吉，得臣之夢似吉而終凶，又一反對也。楚所愛者，曹衛晉

所急者，宋魯則陽從晉而陰爲楚，鄭則始嚮楚而終從晉，皆兩兩相對，所以杼軸而成章也。」⁷³〈城濮之戰〉是《左傳》諸多戰爭敘事中的名篇，方氏之評點，既分析其兩兩對照的篇章結構，可見左氏之「言有法」；同時點明全篇關注於德、禮、勤民之主題意旨，可見左氏之「言有物」。就閱讀《左傳》本文言之，方氏可謂兼顧其「義」、「法」；就評點此一類型的特徵言之，標示符號雖簡要，卻頗能與語言文字兩相呼應，互發其意。

宋、元儒者標點經書，本乎經術、主於義理而不離本文、不廢詞藻，運用圈點標抹等符號分析經典本文，揭櫫其脈絡綱領、關鍵，俾使「辭不費而義明」。所謂「辭不費而義明」，似乎仍以標示符號批點本文爲主，文字注說則扼要簡明，除了考訂異文，所論多係提示段落旨意，以見其精要所在。明清評點風氣大盛，其經書評點轉趨注重篇、章、字、句之法，濃圈密點，而評析之文字也逐漸增多。參考郭紹虞的說法，這樣的評點風氣乃反映出一以「文」的觀點徧閱群書的文學意識。如果以《昭明文選》表徵東漢六朝時「文」自經、史、子獨立出來的發展方向，當時可說是順應四部之學術區分而萌生、確立了獨立的文學意識；相形之下，明清時評點盛行，這表徵的是另一次文學意識的進展，此時似乎有意超脫四部區分的侷限，整合小說、戲曲、詩、詞、古文諸文類，乃至經、史、子群書，

⁷³ 方苞口授、王兆符傳述：《左傳義法舉要》（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影榕園叢書本，改題《左傳義法》），頁13-24。

而一以「文」的觀點讀之，「文」重新含攝經、史、子而形成一種普遍的文學意識，這是基於本文所確立的文學意識。⁷⁴此種普遍的文學意識之形成，未嘗不是從宋元儒者標抹讀經之風轉變而來。

朱熹及其追隨者，由「道」的觀點讀「文」，包含經典以及群書在內，在「道外無物」的普遍性照管之下，「文」獨立於經、史、子之外的獨立性逐漸模糊。這是何基、王柏、金履祥、張達善、許謙諸儒標點經書而分析其本文的思想背景。依黃百家考察，此一學風在許謙之後便有所轉變，他說：「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入明之後，評點家如孫鑛等，不復強調「道」的觀點，也未必有自成一家的思想體系為其根基，於是專就本文之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而論「文」，自標擅場，並準此觀點而徧閱群籍、評點四部，這是基於「本文」而生的普遍的文學意識。針對明代評點家以「法」論文的趨向，清代桐城派評點家方苞則以兼重「義」、「法」振救其弊，當然，所謂「義」仍多就本文所呈現之意義略加申說，比較接近呂祖謙，不復朱熹體驗聖人之心、窮究道理精微的思想旨趣。

⁷⁴ 說參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林氏認為：「如果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文理論闡發可以稱作第一次『文學的自覺』的話，那麼明清之際的小說評點就是中國文論史上第二次『文學的自覺』。」（頁7）並說明清小說評點：「從文本特性中領悟文學特性。」（頁100）

五、評點的基本性質

一旦有經典，就有對於經典本文的閱讀與解釋，純屬個人的閱讀活動及評點自然不始於宋代，而評點刻書之後，個人的隨文評注或圈點想必也還時時在進行。若就刊刻印行的評點文獻而言，評點的對象泛及經、史、子、集四部，具有普遍性。流傳的文獻既多，編目分類的問題隨之而起，勢必觸及如何判定其性質的問題。

傳統的書目分類，一向將注釋的書籍，依其解釋對象屬於經、史、子或集部，歸隸各部。評點文獻之分類，最初也是這樣。漸漸地，分類者不能忽略評點有其獨具一格的特色，於是有所議論，進而有學者主張此類文獻不必考慮其評點對象屬於那一部、那一類，應該統合歸類。《四庫全書總目》是傳統分類的集大成之作，其分類與說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故下文先據以討論。相對的，章學誠（實齋，1738-1801）則頗能代表私家之意見。以下即由傳統學者對評點性質的討論出發，進而提出修正的看法。

（一）從評點文獻的分類問題談起

討論評點的性質，為什麼由傳統書目分類的歸屬問題入手？

因為傳統書目所呈現的是古人對文獻性質的判定，書目分類可為討論學術源流或文獻性質之異同提供一個參照系統。清

代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是傳統分類的集大成之作，在這部書目裡，評點文獻的歸屬仍相當紛歧，當時似乎沒有對評點文獻形成明確的定位。相較之下，大約同時的章學誠則提出了明確的主張，他同樣是以傳統書目為參照，在此分類體系內，評點被歸屬為「評」（詩文評或史評），唯其如此，章氏將評點上溯至於詩文評的源頭《文心雕龍》和《詩品》。

在《四庫全書總目》裡，評點文獻往往著錄於「存目」，這通常表示此類文獻不獲重視。如《孫月峰評經》就附錄在經部五經總義類的存目，《四庫全書總目》曰：「今以其無類可歸，姑附之五經總義類焉」，⁷⁵雖然列在存目，已覺其「無類可歸」。其他的經書評點，也往往遭四庫館臣譏諷貶抑，認為「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或說「蓋為論文而作，不為詁經而作也」，或逕指「非詁經之書」等等，甚至謂王源《或菴評春秋三傳》「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云云。⁷⁶依傳統的分類觀念，評點跟注疏一類的詁經之書顯然存有差異，此由四庫館臣的議論略可窺見端倪。

章學誠乃明確主張：不必考慮評點的對象，這些文獻在歸類上應悉入文評或史評。章氏一向究心於目錄校讎之學，認為這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問。⁷⁷準此而言，如何歸類，

⁷⁵ 《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691。

⁷⁶ 以上，依序見《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490、467、499及頁631。

⁷⁷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引文據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945。

涉及分類者對評點源流及其學術性質的判斷。章氏《校讎通義·宗劉》曰：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為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為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⁷⁸

章學誠認為評點以「評」為主，這類學術可以溯源於鍾嶸（仲偉，469-518）《詩品》和劉勰（彥和，465-532）《文心雕龍》，故曰「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而，他也注意到二書與評點有別，它們「有評無點」，又「離

⁷⁸ 《校讎通義·序》，頁958-959。

詩與文，而別自爲書」。就分類而言，他明確主張「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將評點統一歸入詩文評或史評類。以下，略就統一歸類的意義、評點的特點是否應偏重於「評」，以及何以包括章學誠在內的學者多貶抑隨文「點」、「評」的評點等三項，依序討論辨析。

首先，書目分類係依學術性質以辨其流別，章學誠顯然由「評」來認定評點的性質，主張將評點附入詩文評或史評之下，主要是依四部分類說的，而今看來這是不是最恰當的安排未嘗不可再斟酌；而且，傳統的書目分類，不外七略或四部兩大系統，當前的學術觀念恐亦非這兩大分類系統可以侷限。雖然如此，不問其對象爲經書、史書、子書或文集，而統歸爲一類，這樣的主張恰恰顯示：章氏開始意識到「評點」有其獨特的學術性質，不宜附屬於它的對象。

其次，章學誠由「評」的性質來判定「評點」，依此分類，並溯源於《詩品》、《文心雕龍》等文學批評之書。明確將「評點」歸屬於「詩文評」或「文學批評」領域，章氏是相當早的一位，後來學者多依循此一思路。然而，側重「評」來判定「評點」的性質，是否恰當？若不限於明清評點，而上窺宋、元儒者之標點，或如朱熹只是標抹，後學承之也往往「辭不費而義明」，可見較早的評點文獻或亦偏重於「點」，其語言文字之說明也以提示章旨要領爲主，未必是批評。再以黃宗羲（梨洲、太冲，1610-1695）爲例，黃氏《南雷文定·凡例》曰：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為優劣也。⁷⁹

黃宗羲編定自己的文集《南雷文定》，他有意承續真德秀、謝枋得、唐順之、茅坤以來的評點傳統，至於其隨文加點則旨在標示「其精神筋骨所在」，以便讀者之理解，並聲明：「非以為優劣也」。黃氏指評點肇端於《文章正宗》、《文章軌範》，而未及《古文關鍵》，一間未達；但他循此脈絡溯源，比章學誠切要。而且，黃宗羲觸及了評點究竟以「評」為主，還是以「點」為首要的問題。黃氏顯然是有意識地上承評點的傳統，卻只加點而無評，且說「非以為優劣也」，則他意識中的評點，「點」似居首要；所謂「點出以便讀者」，運用標示符號以分析本文，作用在於引導讀者如何閱讀其「文」，助其領會。那麼，黃宗羲所接續的評點傳統，乃以閱讀和理解為主；就性質權衡其輕重，則評點以「點」為首要，而「評」次之。這正可以應和宋元儒者標點讀經的學術統緒。無論如何，這樣的現象，這樣的認識，在評點發展源流中的確存在。

第三，就章學誠的態度來說，他推崇鍾嶸和劉勰「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對於隨文評識的評點則頗有微詞，貶抑為「論

⁷⁹ 黃宗羲：《南雷文定》（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05冊，影清康熙27年刻本），頁113。

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如果這樣的貶抑是針對特定的評點文獻而發，而其內容果真見解淺陋，倒也無可厚非。畢竟無論以那一種方式進行解釋，見解是否深刻獨到，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論。章學誠曾針對歸有光五色評點《史記》，借題發揮，大加批評。歸氏的評點，被部分學者奉為法式，章氏卻特以專文論其得失，《文史通義·文理》曰：

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餘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祕爾。……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⁸⁰

章學誠此處的議論，已經不限於特定的評點文獻，而是著眼評點此一類型的侷限。他認為一己的心得可以筆誌自省，卻不可定為法式，「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這跟朱熹批評呂祖謙「有箇文字腔子」，認為「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兩人議論，遙相呼應，都對評點定型閱

⁸⁰ 《文史通義校注》，頁 289。

讀的侷限性，充滿憂慮。此外，吳應箕（次尾，1594-1645）批評明人評點，也有類似的見解。吳氏曰：

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為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⁸¹

一已閱讀之心得，是否契合於經典本文之精髓，原就可以商榷，若果逕懸為法程，奉之為定式，難免有「冤古人、誤後生」之虞。朱熹、吳應箕、章學誠等學者往往對評點表示不滿，屢發譏議，這應當是根本的原因。

（二）定型閱讀的解釋類型

個別評點文獻的內容是否淺易簡陋，這跟此種類型的意義或價值理應分別談論，猶如注疏類經解中，隨著解釋者不同，各書的價值亦異。評點文獻之所以「不得而盡廢之也」，當然不只是承認這些文獻既已存在的事實而已，論其意義與價值，還得掌握評點的性質，就其本身來論定。

評點之書隨文批註以呈現其分析離合的閱讀進程，「點」之外，往往還有「評」，兩相結合以分析本文脈絡，提示其義理旨趣或文理關鍵，藉以引導讀者進行閱讀。從宋、元儒者「辭

⁸¹ 吳應箕：〈答陳定生書〉，《樓山堂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貴池二妙集》本），卷15，頁510。

不費而義明」的批點，以及黃宗羲之專主於「點」的標示，由此一側面觀察，則「評」、「點」之中，「點」尤為其特色所在，「評」居其次。「點」具有必須隨文標示的特性，而標示性的符號適合分析、提示，評驚優劣則不夠明確，那麼，「點」特別能凸顯其閱讀的性質，此乃評點有別於傳統詩文評的重要特徵之一。因此，評點在形式上以「點」為要，而「評」次之；性質上，則以閱讀為基本，而批評次之。運用標示符號或評論文字，依附本文予以分析離合，呈現閱讀的理解進程，這是評點的基本性質。

讀者與本文的實際接觸總是在閱讀活動之中，標示符號或語言文字隨文分析其綱目、主意，或警策、要語等，由離而合，脈絡貫通，最終通達其意義之理解。評點不離本文以分析其脈絡，藉此引導讀者進行閱讀進而理解本文，甚至以理解為基礎進行品藻或評論。當然，這樣展示的其實是一種定型的閱讀，在此定型的本文分析中引導理解，使讀者趨向於領會特定的意義。那麼，評點同時是一種解釋類型。

就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而言，經部所收錄的文獻，以儒家經典為中心，由此並發展出的一系列的經解，這主要是「注疏」的解釋類型。「注疏」的解釋由語言入手，以訓詁為方法，藉以克服古今語言的差異；由語言入手分析，常以句讀為基礎，而句讀主要就是根據語言的特性來區分字詞或語句，⁸²由此，

⁸² 關於句讀，清人武億已有系統的研究，所撰《經讀考異》附有《句讀敘述》

進而考釋名物、制度、地理等，甚或辨正異說，循此進路以通經釋義。訓詁的方法起始於注解儒家經典，後來擴展到史書、諸子和詩文集等各種典籍之注釋，成為普遍的解釋方式。⁸³藉經解文獻作為具體的學術表徵，則以儒家經典為中心所展開的注疏傳統，其延續性在世界文明史上無疑是具有特點的文化現象。⁸⁴此一注疏傳統，自是中國詮釋傳統的主流。

相較之下，評點是有別注疏的一種解釋類型，形式或內容都獨樹一格。它未嘗不以句讀、詁訓為理解本文的前提，有些評點文獻就以注疏為底本，可見兩種解釋類型可以並行不悖，相輔而成。但是，兩者關注的層面畢竟有別，仍宜加

二卷（清乾隆 58 年〔1793〕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另外，今人汪耀楠：《注釋學綱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以及董洪利：《古籍的闡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年），二書對於句讀之學有專章、專節的討論；又，任遠：《句讀學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則是這方面新近的一部專書。

⁸³ 注疏傳統，是以儒學為中心所開展出來的，兩漢以降，隨著經學的流衍，持續發展，並擴大影響，故蔚為解釋型的主流。先秦諸子雖然也有若干解說性的論述篇章，畢竟沒有持續發展，沒有像經學一樣形成脈絡分明的注疏傳統；而且，後來史籍或詩文注解的方法，也跟先秦諸子的解說方式無甚關聯。並參張大可：《中國歷史文獻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449；汪耀楠：《注釋學綱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頁 297；以及拙著：《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年），頁 2-5、頁 87。

⁸⁴ 參考黃俊傑：〈舊學新知百貫通——從朱子《孟子集注》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浩瀚的學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頁 199-202 及頁 222-223；又，《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58。以及陳來：〈價值·權威·傳統與中國哲學〉，《哲學研究》1989 年 10 期，頁 26-27。

以區分。⁸⁵

評點關注的是本文，以分析本文脈絡為手段，運用標示符號隨文段畫點抹，或在文字之間、天頭、篇末以語言文字提要抒論，藉以指陳其綱目、主意、警策所在，或布局、承應之結構，或用字修辭之巧妙等，由離而合，以貫通全篇、理解其傳達之意義。展示評點者之閱讀，並引導其讀者閱讀，因此，此類文獻卷首常載有「看文字法」或「讀法」等理論通則，相對的，隨文呈現的本文評點則是前者的實踐運用。在實踐之中，評點展示的是一種定型的閱讀，引導其讀者通達特定理解，形成一種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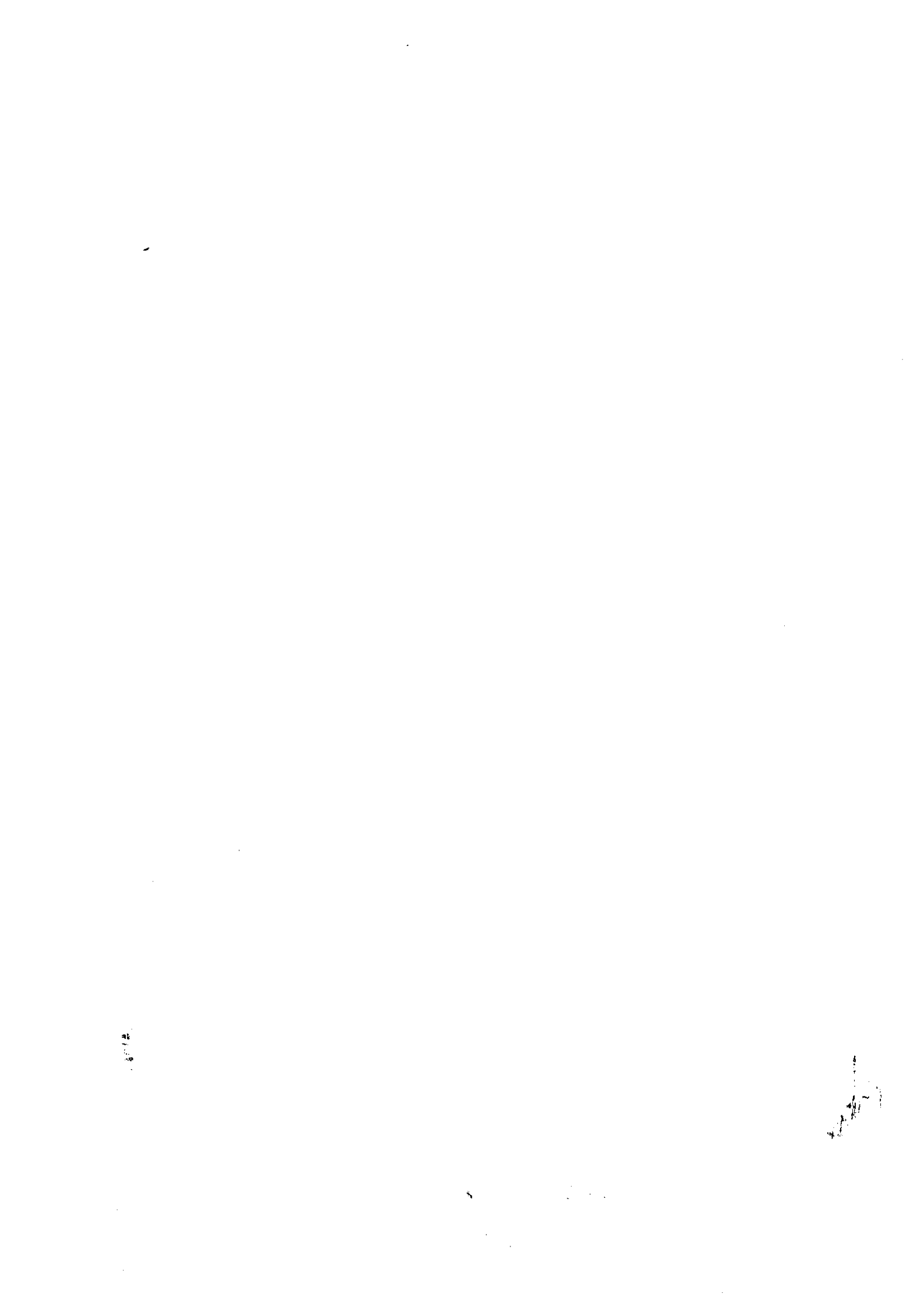
經典之為經典，常穿過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讀者不斷展現其歷久常新的意義，方能顯其義蘊無窮。而評點僅僅是一種定型的閱讀，因此，面對經書評點時，特別容易萌發「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的緊張和疑慮。經典原可以適用於不同時代、不同人物，隨著讀者視域的改變，經典本文綻現不同的義涵，故能久而彌新，原非一成不變。儘管章學誠貶抑隨文評識的評點，卻也不能不同意，閱讀經典而一旦心領神會，讀者未嘗不能自誌心得；而且，從引導初學之揣摩玩

⁸⁵ 《五經正義》屬於「疏」，參考張寶三：《五經正義研究》，疏文中間或論及「區分章段」，以及「文勢」、「文次」等，頗涉及上下脈絡或修辭，而多與訓詁有密切關係（頁 706-781）。既然多為訓詁而發，往往因應討論需要而論及，並未成為「義疏」之體的定例通則，因此，溯源而視此類現象為義疏對評點的影響固無不可，但兩者性質的差異也不應混淆。

味而言，閱讀的記錄或展示，「未嘗不可資其領會」、「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評點既是一種定型閱讀的具體展示，誠然不脫「一時有限之心手」，乃是一時的、有限的閱讀；而經典的特性又在其能歷久彌新、義蘊無窮，那麼，閱讀經典的讀者應當更多一分自我警醒，不以單一的解釋自囿。相對的，經典雖然蘊義無窮，理解本文的意義進程還是得落實在實際的閱讀活動，而這活動總是一時的、有限的，經典歷久常新的意義，未嘗不是在一次次閱讀活動中，因讀者之閱讀、理解，而一次又一次地闡發出來。評點展示閱讀的活動，不論是個人自誌筆記，抑或印刷流傳，不論只供自我省識，抑或傳示於眾人，總之，評點記錄下經典閱讀的一種可能性，使這種理解與解釋的可能性由隱蔽而彰顯。

六、結語

評點關注於本文，運用標示符號、語言文字分析其脈絡，展示一種定型的閱讀，通達特定之理解，使此一解釋的可能性由隱蔽而彰顯。這種解釋類型藉由印刷刻書，「具載本文」而與經典同刊共傳，居間說話，從閱讀以及引導閱讀的傳遞性質而言，評點的流傳，未嘗不是經典延續和流衍的一個歷程。評點，它相對於注疏而自成一種解釋類型，關於經書的評點也縣延成一個小傳統，這在中國經典詮釋的領域裡，也應佔有一席之地。



4

1812